

【文化杂谈】

岂可忽视『美育』

□陈心想

三十多年前,画家吴冠中先生在《北京晚报》发表过一篇《美育要比文盲多》的文章,认为中国的美育比文盲多。吴先生讲了几个小故事,其中一个是在被称为“小三峡”的大宁河的旅游船上,几对青年男女全然无视两岸如诗如画的美景,各自捧着小人书看。20年后,吴先生大概是看到了“美育”现象没有改观,又写了一篇《再说“美育要比文盲多”》。吴先生说:“我说美育要比文盲多,是千真万确的。溯其源,我们从童年时代便遗忘了美育教学。”

读吴先生的文章,我想起了自己的教育经历。我在中小学时,是没有上过音乐和美术课的,艺术教育一片空白。幸好后来念了中师,音乐、体育和美术课全有了,至今还记得,我开始上音乐课时,一唱歌就跑调。现在的中小学艺术教育如何呢?我的朋友们告诉我,和当年差不多。在高考的指挥棒下,这些课程全被挤掉了,因为“不实用”,如果不打算考艺术院校的话,考试不占分。多年来,乡村学校的艺术教育几乎一直是空白。城市里肯定比乡村好,而且好得多,但是因为升学压力,很多学校同样在压缩这些课程。

我到美国的第一个感恩节,社会学理论课教授把几个国际学生邀到家里过节,饭后教授和其长女为我们表演了几首小提琴合奏曲,虽然我不懂西洋乐曲,但还是能感受到其动人之美。后来在不同场合又领略了其他教授们的艺术修养。同时我也发现,学生们经常带着大大小小不同的乐器穿梭于校园,他们是不同俱

乐部的成员。于是我就开始留心美国的艺术教育。这里的幼儿园课程中,音乐和绘画是每天必不可少的。在美国小学里,每个学生到了三年级,都要选学一门乐器,参加学校的乐队,并参加一些节日庆典等演出活动。这些都是普及性的艺术教育,而不是专业性的职业教育。到了大学,有艺术系,外系的学生可以选修该系的课程。

说艺术教育不实用,是一种庸俗的实用主义,认为不能当饭吃的就都没有用。根据科学研究,艺术教育可以给学生带来许多好处,比如提高想象力、注意力、自信心以及团队合作能力。李政道先生就研究过科学和艺术

通过比较认为“科学与艺术同属感情创造或创造性感情的事业”。美育不仅有助于智育发展,还有助于科学思考。蔡元培先生早就要我们重视美育,要以美育代替宗教,解决人们的信仰问题。所以,美育也有德育代替不了的益处。

我们曾经为了扫除文盲下了一番大力气。现在文盲极少了,但美育还是很多,这个问题自然就不可忽视了。如果仅仅是看小人书而忽视两岸美景这样“不懂美”的小青年,也无损于祖国的大好河山。可是,如果大量的美育小青年拥有了规划城市、改造河山的大大小小的职权,则会让我们这个泱泱大国铺天盖地地呈现出一派暴发户的庸俗风格。因此扫除美育甚为迫切。首先,要在态度上重视。美国对中小学艺术教育的重视,甚至总统都插手过问,更不用说各地方长官。其次,要有政策上的规定。美国有47个州对艺术教育作了强制性规定,40个州把艺术教育纳入高中生毕业考核内容。再次,就是执行问题。我们的教育纲要也有相应的要求,但是往往执行不力。最后,就是资金问题。艺术教育往往花费较大,比如纸张、笔墨、画笔、乐器等。

对于学校艺术教育,城市里有很多优势,比如艺术博物馆、城市地标性建筑、公园、广场等,都有着很好的丰富的审美教育的材料。其实,乡村也有自己的天然优势,那就是大自然本身之美,比如空旷的原野、无边的花海。生活中充满了美,需要有

人去发现、诠释。要从中小学,甚至幼儿园开始潜移默化,扫除美育,师资无疑是重中之重了。这种艺术的审美,开始要有具备很好的美学修养的老师来引导。吴冠中先生举的例子足以说明这个问题:

那天正是清明节,成群的小学生到烈士陵园扫墓后又打着红旗顺路来参观汉画馆,嘻嘻闹闹而来,嘈嘈杂杂而去,扬起了满馆飞尘。孩子们见到了什么呢?我沉默于回忆中:青年时代在法国留学,我的法语很差,听学院的美术史课只能听懂一半,很苦恼。有一回在卢浮宫,遇到一位小学教师正在给孩子们讲希腊雕刻,她讲得慢,吐字清晰,不仅讲史,更着重艺术,分析造型,深入浅出,很有水平。我一直跟着听,完全听懂了,很佩服这位青年女教师的艺术修养。

这里参观南阳汉画馆和法国卢浮宫的领队老师的对比,颇值得寻味。参观汉画馆的领队老师显然没有向学生们讲解汉画馆的画,而这位法国小学教师就对希腊雕刻做了精彩的讲解,相信两群孩子参观后的审美收获肯定不同。我们需要的,正是那位法国小学教师一样的老师。

立于礼,成于乐。中国古圣贤都重视艺术教育,它能教化普罗大众,启迪人们美的心灵。中华灿烂的古代文明都是以“郁郁乎文哉”的审美意识为基石的。在中华民族走向复兴的今天,我们的教育岂能忽视大量“美育”的存在?

(本文为作者为旅美学)

【一家之言】

养生不是吃药

□朱树松

人们对于养生有一个极其错误的认识,那就是把养生视同于药补。一谈起养生来,就会大谈吃补药的问题。养生是什么?养生就是立足本土,勿攀异习;莫逆季节,顺时生活。以最自然的状态维护生命,把日常的生活回归到自然规律中去,使生命的本能发挥到最佳状态。古云:“避风如避箭,避色如避乱;加减逐时衣,少餐申后饭。”这才是真正的养生。养生大多是针对身体正常的人而言的,当然,也不排除有病的人。有病的人在服药病愈后,为了保持身体的正常状态,不致再出现或尽量少出现病患,应当养生。而药补却不同,药补是生命体有了偏差,出现了需要用药去补的虚弱症候,才可以施以药补,是用药的“毒”性力量把身体出现的偏差纠正过来。病大都是因为生命偏离了正常规律而出现的异常现象。

如今,由于宣传的误导,或因利益的驱使,把药的药用功能混同于养生去谈,把治病等同于养生,以至于把不懂药理而有养生心理的群体的欲望调动起来,形成了以药补为养生的“服药”大军。那些以利益为目的的制造商把混上中药的食品包装得格外精良,做着只好无坏的强势宣传,误导着那些不懂药性的群众。前些年,在笔者长辈的邻居中,有一位离休干部,虽然身体硬朗,也不知哪一天开始,他突然迷上了那些以养生保健为借口、实则牟利为目的的商人售卖的产品,不惜重金购买那些说明中含有滋补功能、以中草药为主要成分的所谓养生食品,还热情地向邻居宣传,不知道的还以为他是经销商呢。其结果怎样呢?初服浑身是劲,再服头晕脑涨。这时他还不听好心人的劝阻,一心忠诚于推销商宣传,最终导致猝死街头。这是多么悲哀的事啊!

仅就中药的上品、号称百草之王的人参而言,其功能重在补虚救脱。在需要用人参补虚的药方中,人参不可大用,不可单用。而在救脱(抢救)时,人参是可大剂量单方一次性应用的(也要视患者的实际情况),使患者能起死回生。如重病虚极欲脱,可重用人参一味,浓煎服汁,便可奏良效。但这是治病,而且还要病缓即止,不需要如西医所说“再巩固巩固”持续服上几天或是一段时间。

中药就是中药,中药是中医施治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治疗疾病的具体药物。笔者曾经在《中医乱弹》中说:“中药是‘原生态’,大多是天然的植物、动物和矿物,以植物为主,故有‘草本’之说。有的是使用原物入药,有的是经过中医特有的炮制方法加工后入药。中药的炮制是让‘原生态’本性极致且安全地发挥,而不是‘化学’。”可怕的是,有些所谓“养生专家”或者经销商以西医化学原理的用药方式,给患者或者是认为需要养生的人提供处方中药或带有中药的养生食品,全然不知这中药的危害性。

古人虽有“大黄救人无功,人参害人无过”的说法,但这句话里有两个关键的字却让人深思,一“救”一“害”,实则已经利害关系分明。其实,这句话是“反语”,也是古人对人参“害人”的总结。现在,千万别曲解了古人的意思,一味弘扬“无过”,却把至关重要的“害人”忽视了。

养生不是吃药!

(本文为著名书法家、诗词家,曾供职于山东省文联)



【大师印象】

李霁野先生印象

□刘增人

我之对于鲁迅,韦素园、曹靖华、李霁野、台静农等为主要成员的未名社一直怀有一种莫名的敬意,那缘由,主要是被鲁迅的《忆韦素园君》(见《且介亭杂文》)深深地感动,尤其是其中那些每次翻读甚至是无端想起时就心潮难平的警句。

从第一次读到这冷冽到灼人心扉的文字,我就一直在探求到底是在什么样的社会氛围中,什么样的文坛情谊与人生遭际,才能够酿就这样的情怀,长养这样的交谊,迸发这样的感悟?找不到现成的答案,我的老师书新先生告诉我,只有通读未名社主要成员的作品,并且设法还原该社从成立到消泯的历史过程,才有可能洞悉底蕴,破解奥秘。于是,我开始编纂李何林、李霁野、台静农、曹靖华等人的著译系年目录,希图通过编纂,先找到他们到底有哪些作品,发表在何处,依次推导出由此而陆续展开的文坛图景。而最早比较成型的,就是李霁野。那时我只能用复写纸每次写成3份,1979年秋寄给李霁野先生的就是复写稿。也许是这种纯“手工业”的产品感动了刚刚复出的李霁野先生,他很快复信,并补充了许多材料,大多是我看不到的翻译成果。随同复函寄来的,是刊载有李霁野先生文章的《鲁迅诗歌研究(下)》,由中共安徽阜阳市委宣传部鲁迅作品学习小组、阜阳师范学院中文系合编,1979年6月出版,系“学习与研究鲁迅参考资料之一”,赵朴初题写书名。该资料第一辑收录的是许广平、王瑶、楼适夷、孙席珍、钟敬文、戈宝权的文章,第

二辑收录的是锡金、静闻、臧克家、李霁野、胡炳光、周振甫、陈颂声、内山嘉吉、实藤惠秀、赵瑞蕻、王汉元、屈正平、高田淳、赵朴初、牛维鼎、熊融、越善、丁景唐、王尔龄、徐重庆、漳河等的文章。还收到李霁野先生赐寄《我心中的鲁迅》(湖南人民出版社1979年10月版)、《鲁迅先生与未名社·未名小集(1)》(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3月版),该集1984年7月由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重印后,李霁野先生于1985年7月1日又签名相赠。1984年12月1日,还收到李霁野先生的签名本《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集·被侮辱与被损害的》(李霁野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11月版)。

这些赠书,我没有完全读完。妥氏的小说太阴郁,我自己的心情本就不怎么爽朗,每读都倍感压抑,只得浅尝辄止,罢卷废观。想到大约还可能有一些和我一样想知道鲁迅和未名社的关联、缘于的朋友,就发愿编写一册关于未名社来龙去脉的小书,力求客观还原历史发生现场。大约是1988年前后,我把思考良久的《未名社研究

概论》的选题向某出版社的领导陈述,当场拍板定局,列入该社正在组稿的一套“丛书”,作为社方约稿正式出版,并约定了字数、体例和交稿时间等,我于是放心地开始编写。大约一年半后,书稿雏形已就,我却被通知该选题取消了。我不愿询问有关方面,想知道被取消的具体内情,因为大概和未名社当初解体的某些原因近似。但我和未名社研究的机缘也就胎死腹中,终于无药可医。只有鲁迅赞许韦素园的文字,还时时烙印着我的心,时时催生我对于鲁迅的敬仰。

我早就知道鲁迅被边缘化已成定局(其实又何止是鲁迅),以至于我的一位对于中外古今文化统统毫无兴趣的晚辈,春节前也开始以传播谣诬诬陷鲁迅而自鸣得意,好像由此也许就奠定了自己“资深”文化人的身份,但我依旧痴心难改,因为我多次读过鲁迅的全部作品,包括书信、日记和集外佚文,对于鲁迅的生平事迹也长期有所考察,深信自己心目中的鲁迅确是中国近百年文化史、文学史、思想史上的一座巍峨高峰。其他高峰固有自己的风采,但谁也不能替代鲁迅,正如鲁迅也不必替代他人一样。这个世界已然多元化,诬陷鲁迅还是敬仰鲁迅,谁都有选择的自由。最重要的一点在于,在诬陷之前,之后亦可,最好认真地读几篇鲁迅的作品(例如《忆韦素园君》,例如许多书信),平心静气地读,不怀邪念地读——至少是不要满怀邪念地读。

(本文为著名学者,青岛大学教授)